

治理殖民地自然： 臺灣有用植物調查之展開*

蔡思薇**

摘 要

本文分析日治初期來臺進行植物探險至臺灣總督府「有用植物調查」前後之過程，交錯使用植物目錄、植物誌、植物標本及北海道大學文書館藏「宮部金吾舊藏書簡」可發現，十九世紀日本植物學發展長期受制西方，學界能力有限，但在帝國擴張下，如何「務實地」進行殖民地的植物調查工作，成為必須面對的課題。有別於過去偏向直線式東京帝國大學掌握臺灣自然政策的論點，本文認為，種種帝國植物學術能力上的限制及因素，方是東大不得不負擔研究臺灣植物的要素。日治初期臺灣植物調查擺盪於「治理」與「能力有限」之間，1896 年東大探險僅是先聲，1905 年臺灣總督府有效改良過去作法，總督府掌握在地資源、田野採集及大量植物觀察的方式，才是「有用植物調查」獲得諸多成果之因。在科學網絡方面，札幌農學校、東大的植物學菁英，加上臺灣總督府官員，各有參與及分工，亦達成不同面向的收穫。有用植物調查在帝國治理意義上，向來超乎「有用」，兼具政治象徵、殖民地統治、科學發展多重意義，也非單一帝國／殖民地上下支配關係可解釋。整體而言，該調查至 1910 年的成果，已大幅改寫過去數百年的臺灣植物認知。日本人從不識臺灣草木，到本階段能符合臺灣治理需求，出版《臺灣植物目錄》等通用書籍，亦開始向海外展現「治理殖民地自然」之成績，該調查亦開啟臺灣植物研究在地化累積的里程碑，為往後臺灣主體性之植物學術研究，奠定基石。

關鍵詞：植物調查、採集者、自然史、新渡戶稻造、川上瀧彌

* 本文部分資料承蒙 2017 年「中央研究院獎助院內人員短期赴國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研究試行要點」補助，前往東京大學理學系研究科小石川植物園進行短期資料蒐集與研究。感謝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以及東京大學小石川植物園園長邑田仁、夫人邑田裕子、東馬哲雄；東京大學總合博物館大場秀章、池田博、清水晶子；北海道大學文書館山本美穗子等人的協助。審查期間，亦獲得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會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在此特申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

來稿日期：2021 年 9 月 14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12 月 8 日。